

重庆心理学三十年

(1949—1979)

重庆市心理学会

重 庆 心 理 学 三 十 年

重 庆 市 心 理 学 会 编

重 庆 师 范 学 院 印 刷 厂 印

1 9 8 3 年 3 月

目 录

题《重庆心理学三十年》	潘 菽 (1)
《重庆心理学三十年》序言	刘兆吉 (4)
重庆心理学三十年	重庆市心理学会 (6)
附载：向献身心理学工作的潘菽同志学习	唐自杰 (55)
编后记	编者 (71)

题《重庆心理学三十年》

这本小册子是论述建国以来重庆地区三十年间的心理学这一学科的工作开展情况及其成果的。这样一种论述是有意义的，也可以搞得很有意义。意义就在于这样的论述是把一个地区在一较长时间内的心理学工作总结一下，看看做了多少工作，有了多少收获，取得了哪些经验，还有哪些缺点应该从其中吸取教训，以期明确今后应该怎样继续前进。

从这本小册子的内容看，可以说重庆地区在建国以后三十年中所进行的心理学工作是不算少的，是发展之势喜人的。但能不能就此令人感到满足呢？当然还不能。一个人在出生以后三十年可以长得很成才了。一个学科，尤其心理学，却不那么容易。重庆地区三十年来的心理学工作确实做得不算少了。这是十分可喜的。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才能发生的新气象的一种表现。但是，为了前进，为了争取更好的发展，我们有必要从两方面来考察一下所有已做的工作。一方面我们要考察一下我们已做的工作本身究竟做得怎样。另一方面我们要考察一下我们已做的工作曾否产生实际效果以及效果究竟如何。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已做的工作并不做得怎样，那也不要紧，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不奇怪的。因为，一切事情总要经过一个发展过程。一项工作如果是需要做、应该做的，能做了就好，但要坚持下去，力求一步一步提高，直到取得相当完善的、可以使自己和别人都认为是满

意的并能产生良好的实际效果为止。如果一个人不能把一项工作坚持做下去，也可以由另一个人继续做下去。例如，关于小学生的数概念的发展这个问题，重庆地区有人做，其它地区也有人做。当然各有收获，各有贡献。但也很可能是各执一端，各不全面，也欠深入。其结果也只能是难于产生实际的效果，难于使科研的成果对实际的教学工作起到怎样的帮助作用。如果一项科研工作，即使本身做得不差，但并不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那也不免是一种浪费。譬如打仗，要攻下一座城池，只是你来攻一下就跑开，他来攻一下就跑开，怎么能把它拿下来呢？为什么不能大家从几个必要的方面分工合作来同时攻打，并且一天不成就两天，两天不成就三天这样坚持下去，直到攻打下来为止呢？小学（当然也有中学）中的数学教学确实需要研究以提高效率。就小学生数概念形成、发展问题看，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可以考虑组织一个相应的研究小组，分工协作来进行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坚持研究再研究，直到研究出一种最有效、最科学的养成小学生的数概念的形成和发展的教学方法，使小学教师都能掌握运用。这就象攻打一座城池就拿下这座城池，使所花的每一份力量都能产生积极的效果，不致成为浪费。数概念形成的心理学问题的研究可以考虑这样做，其它学科亦许也可以同样考虑。不仅中小学各学科教学的心理学问题可以考虑这样做，其它的心理学问题的研究也可以同样考虑吧。

关于组织协作，在同一地区内考虑固然最好，因为可以联系比较密切，交流经验和商量问题比较方便，研究场地也可以选用同一个或两三个学校，不过要跨地区组织也不是不可以的。当然，要这样做，就须要减少一点“私有观念”，增

加一点社会主义的精神。

为了适应全面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要求，我们的心理学也必须加紧努力以争取开创一个新局面。上面的个人建议能不能作为我国的心理学开创新局面所可以采用的一种措施呢？

我国各地的心理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为四化作出贡献的热忱都很高。但大家在工作上，例如在研究工作的选题上，几乎都是各自为政的。这就要导致工作的重复和人力的分散，而问题的解决也难于全面、深透而系统，因而全部工作的进展也只能慢而实效不显。恐怕组织起来协作攻关是我国现在的心理学打破旧局面、开创新局面的一项可以考虑的途径。广泛开展协作攻关是最适用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的。这是我们的一项优势。我们要运用这项优势。

潘 菽

1982年12月5日

《重庆心理学三十年》序言

《重庆心理学三十年》在重庆市科协的关怀和重庆市心理学会会员们的赞助下，经过唐自杰同志的艰苦工作，在积累多年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多次调查，多次核实，又广泛的征求意见，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编写任务。不久即将付梓问世了。

这本小册子记载了重庆市心理学工作者自1949年到1979年的心理科学学术活动。这是一本地方性质的学术活动小史。写史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便于回忆过去，更重要的是为了辨识前进的方向，预想未来，需要想想过去，否则方向不明。

《重庆市心理学三十年》和其他省市心理学活动史有共同之处，但也有它的特点。它和重庆市科协发展史一样有它光辉的历史根源。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南京沦陷，重庆作为陪都。沦陷区许多爱国的科学家、教授来到重庆。这时，周恩来同志正在重庆任南方局书记。1939年春，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有些进步的科学家组织起来，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为了预防反动当局的迫害，“组织是公开的，成员是不公开的”^①。现在的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潘菽同志，

注①见谢立惠：中国科协史上值得回忆的一页，《科协通讯》1981年51期。

当时也在重庆，任中央大学心理系教授。他就是“自然科学座谈会”的积极参与者。他早已意识到从西方引进的心理学需要改造，他试图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创建适合中国的心理学，他在教学和发表的文章中，已经透露了他的新观点。如果说，“自然科学座谈会”是重庆科协的根源（实际也是中国科协的史前史）；同样，重庆心理学界的学术活动也不只解放后的三十年，潘菽同志和受其影响的学生和同志，早在抗战期间就在散播唯物主义心理学的种子了。解放后三十年来，潘菽同志一直担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职务，领导、团结全国心理学工作者为推动、发展我国心理科学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潘菽同志也非常重视和关怀《重庆心理学三十年》的编写工作，并且为这本小册子题词，进一步指明重庆心理学会今后活动方向。在这本小册子即将问世的时候，饮水思源，由衷的感谢潘菽同志。

刘 兆 吉

1983年一月二十三日

重 庆 心 理 学 三 十 年

(1949—1979)

重庆市心理学会

前 言

解放前，抗日战争时期，心理学在重庆地区有过较大的影响。当时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是战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中心。心理学也一时成为全国的中心。当时的师范院校和医学院都有心理学课，前中央大学心理系、前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和前中央卫生实验院心理卫生室等心理学教学和科研单位都在重庆。一些著名的心理学家也在重庆。

当时心理学的教学和科研主要是照搬欧美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心理学，但也有少数心理学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试图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来考察和阐述心理学问题，并以此教育学生。潘菽同志是这方面的代表人。从他所讲授的“理论心理学”中可以明确看出这一点〔1〕。他除了在学校上课和耐心指导学生以外，还积极发展和支持校外的心理学工作。他写过一些有关心理科学的文章，提倡“学术中国化”、“把应用心理学应用于中国”、教育也要发展适合中国的教育。他反对滥用测验，特别反对用心理技术为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2〕。

1946年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党组织领导下创办的《科学与生活》杂志，一开始就得到潘菽同志的支持，并为之撰写了重要文章——《中国现阶段所需要的科学工作》。1946年4月底，《科学与生活》杂志为纪念“五四”，举行“怎样开展新的科学运动”的座谈会，潘菽、丁瓚等知名的心理学家都积极参加〔3〕。丁瓚在战时在沙坪坝南开中学开展过心理卫生工作。潘菽还在陶行知办的社会大学讲授过普通心理学〔4〕。

在潘菽等心理学家的影响下，《科学与生活》杂志与稍后创刊的《徬徨》杂志（也是由《新华日报》社党组织领导的）都吸收了心理学工作者参加，并刊载过一些心理学的科普文章，如《心理常识漫谈》、《科学的学习方法》、《论环境》、《做到老，学到老》、《你的心理健康吗？》等。

《徬徨》杂志还创设了“心理服务部”，为读者解答有关心理修养方面的问题〔5〕。后来，在1948年11月，一些心理学工作者还组织成立了“重庆市心理卫生协会”，目的在宣传和普及心理卫生知识。在此前后，在报上刊载过“儿童心理卫生”和“心理卫生”专刊各数期。后来还出版过一本《儿童心理卫生》〔6〕。当时报刊上介绍心理卫生知识的也比较多。

但在解放前那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是不能正常发展的。因此一些有觉悟的心理学者便积极投身到爱国民主运动的革命斗争中去，为团结进步的科学工作者，扩大党的统一战线而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这些人中的代表人也是潘菽同志。

“七七事变”后，潘菽随前中央大学到重庆，在山城住了九年。在这期间，他通过大哥潘梓年的关系，有机会得到解放区的书刊和消息。他长期订阅《新华日报》，了解党

的方针政策，并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最初，他在重庆参加了由郭沫若等知名人士发起的“学术研究会”。后来，他和一些进步的学者组织了“自然科学座谈会”。聚会时，他们不仅交换关于时事的意见和解放区的胜利消息，并且定期学习《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马列主义著作。1944年，他又参加组织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并兼任会刊《科学新闻》的主编。他还和一些进步学者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这是九三学社的前身。自1945年9月3日九三学社建立以来，他长期担任社中央的领导工作。

由于潘菽同志的积极参加民主与科学运动，他常受到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他曾是重庆“周公馆”的座上客。1945年8月毛泽东主席在重庆期间，在桂园接见的民主教授中间，就有这个通过心理学教授的身分宣扬进步思想的潘菽同志〔7〕、〔8〕。

心理学是关于人类最重要的一门科学。从事心理学工作的人“需要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建立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服务的思想感情”〔9〕。抗战时期在重庆的老一辈的进步的心理学工作者，他们教书又教人，同时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团结同志，为人民服务，为民主革命事业奋斗。他们为重庆心理学留下了一个好的传统，值得我们学习。

解放后，由于党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和社会的需要，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广泛传播，心理学有了迅速发展的可能性。但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三十年来，重庆心理学的发展也走过曲折的、不平坦的道路：有时前进，有时停滞，

有时遭受严重的破坏，有时又迅速地发展。因此认真回顾和总结一下这段时间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后的工作将有重要的意义。

三十年来，重庆心理学的发展，大致可分四个时期。

(一)

从1949年重庆解放到1958年，这是重庆心理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这是由沿用欧美心理学进行教学发展到全面学习苏联心理学，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的时期，也是心理学教学的计划、教材和方法由不正规到逐步正规并日益取得教学经验的时期。

解放初期，大多数心理学工作者，工作热情很高，他们希望以心理学知识来为新社会的革命和建设服务。但这时在师范院校及保育学校所讲授的心理学，基本上都是解放前欧美资产阶级国家传来的心理学。那时的心理学工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亦未得到改造。经过学习社会发展史、《实践论》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过参加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及思想改造等运动，初步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纯技术”和“超政治”观点、个人主义、脱离实际以及崇洋崇美等思想的危害，初步认识到知识分子应该努力改造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才能更好地为新社会服务。这就为撇开欧美的心理学知识，学习苏联的心理学知识打下了思想基础。这反映在教学中，就是自觉地用所能接触到的少量的苏联心理学知识来替换原来的心理学知识。那时有的同志发表的通俗读物和文章中，其中谈到的心理学知识大都具有这

种过渡的性质〔10〕。

现在看来。当时对欧美的心理学知识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并没有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认真的分析批判。所以有些可用的具体知识和作法都被否定了；有些不正确的东西，由于未进行过分析批判，后来一旦有条件时，又原封不动地搬出来。这妨碍了我国心理学的正常发展。这有当时的客观原因。那时重庆市的心理学工作者还没有组织起来，大多数人的马列主义水平和业务水平都不高，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分析批判工作。独立地分析批判比单纯地学习要困难得多。

以后随着苏联柯尼洛夫《高等心理学》（1952年8月译本初版）、捷甫洛夫《心理学》（1953年11月译本初版）、查包洛塞兹《心理学》（1954年5月译本初版）等传到重庆，心理学教师便在教学中逐步利用这些材料。随着中师心理学教学大纲、中师心理学课本（1953年4月初版）及高师心理学大纲（1956年8月）等传到重庆，心理学的教学内容便愈来愈稳定了。高师根据苏联心理学和我国的教学大纲，多次编印心理学讲义，主要供本校教学之用〔11〕。

在这期间，为了更好地理解苏联心理学的内容，还努力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学习翻译出版的苏联心理学理论。有的因此而学习了俄语。当时重庆还有少数同志到北京听苏联心理学家的讲学或到有关的高等院校进修。在重庆的同志也注意学习苏联心理学家的讲义。有的苏联心理学家还来重庆讲过学〔12〕。

在心理学教学中，也努力学习苏联的教学经验，如进行条件反射试验，进行课堂讨论、个别考试，以及指导学生作

心理鉴定等。有的同志还编写了教学参考用书〔13〕。

这时期，由于教材逐渐稳定，经过反复实践，也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心理学的教学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

这时期，心理学知识的普及工作也在进行。高师和中专心理学教师中都有些同志作过科普报告，有的同志发表过科普文章，有的同志进行过批判唯心主义心理学的报告，但这些都是很初步的。这时期，心理学的科研工作未开展，只个别同志发表过科研论文〔14〕。1956年8月，有几位同志就“白鼠实验”问题开展过一次学术争鸣〔15〕。

1953年12月，由叶麀同志主持筹备中国心理学会重庆分会。1954年5月，当时的重庆市科联指示由叶麀、周应培两同志共同负责筹备。当时登记的旧会员5人，申请入会的13人，共计18人。学会工作在这段时期实际上还并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

在这段时期，学习苏联心理学，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对于改造旧的心理学，对于学习以马列主义观点来考察心理学问题，对于学习苏联的心理学教学经验以培养师范生，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的毕业生，有的现在还认为当时心理学学得比较扎实，对教育工作有作用。但在当时，只强调全面学习苏联，处处以苏联心理学家的是非为是非，没有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结合我国实际来对苏联心理学进行分析鉴别，这种带有教条主义倾向的学习态度，对于我国心理学的发展也带来了不良的影响。这是导致后来被人利用，作为借口来批判心理学的原因之一，虽然不一定是主要的原因。

(二)

从1958年到1966年的中期，重庆地区的心理学研究工作和学会活动曾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心理学的教学工作亦渐趋于正常。但在这阶段的前期和后期，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都处于动荡不定，有时甚至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1958年上半年，在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有的心理学工作者被错划为右派或被批判的基础上，又开展了学术批判，发动学生给教师贴大字报。同年8月，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开始的批判心理学的资产阶级方向的运动，声势浩大，波及全国。在重庆地区，亦深受影响。有的学校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了一些心理学教师〔16〕。有的学校虽未开展这种批判，但思想上受到的压力很大，感到不知所措。

在这次批判中，提出了心理学的抽象化、生物学化、以及理论脱离实际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作为学术问题，按照“双百”方针来进行讨论，那是完全可以的。但当时采取的不是摆事实、讲道理、互相争鸣的方针，而是用武断的、压服的、围剿的方式进行，把学术问题与政治立场混淆起来，用政治结论代替学术争鸣，被批判的对象几乎没有发言权。这次批判是在整风反右后进行的，许多心理学工作者只好人云亦云，随“风向”变化，不敢发表什么独立的见解。这对于以后心理学的教学和科研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这次批判后，心理学课停开了。一些心理学教师根据领导的意见到公社、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参加工农业余教育工作。后来还组织起来，到中学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学生参

加生产劳动以及教学和德育方面的心理学经验〔17〕。以后还有一部分心理学教师下放到小学担任实际工作，同时进行心理学的研究。这样到校外进行调查研究和参加实际活动，开始多是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下去。但这种活动逐步深入和经常化以后，对心理学的教学和科研确实也带来了积极的效果。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的。

1959年3月后，各地开展了对心理学学术问题的讨论，目的是为了澄清1958年心理学批判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重庆地区亦先后进行了心理学的性质、心理学的对象和心理的内部矛盾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18〕。这种讨论一直延续到以后几年。

1959年9月—1960年7月，重庆地区有同志在心理研究所参加协作进行科研，并写出了科研报告〔19〕。

1960年1月17—23日，中国心理学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会议。西南师院编的、印送会议的《毛泽东论人的心理》，是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事。还有同志在会上作了研究报告〔20〕。

1962年2月下旬，中国心理学会召开了教育心理专业会议，重庆地区共送去科研论文14篇〔21〕。出席代表刘兆吉同志回重庆后进行了广泛的传达〔22〕。

1962年6月24日，召开了重庆市第一次会员大会，出席会议23人（列席的心理学工作者8人），宣布了重庆市心理学会的成立，并选出了以刘兆吉同志为理事长的理事会（理事还有叶麋、唐自杰、祖光寰、张增杰、蒋明诚、张克东）。会上讨论了心理发展的内部矛盾问题，还交流了联系实际开展科学研究的经验〔23〕。

1963年3月2—3日，重庆市心理会举行了第一次学术年会。会上宣读了四篇心理实验研究报告〔24〕。同时还展览了1962年的科研成果：论文和实验报告31篇，译文4篇，1962年用心理学教材6种，约六、七十万字。

1963年11月16—18日，在四川省心理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年会上，重庆会员报告了论文及研究报告7篇。在分组讨论时，有的同志还作了有关儿童年龄特征及儿童道德品质的培养问题的中心发言。在这次会议上，重庆共送去论文及有关资料18篇〔25〕。由于重庆市心理学会先成立，它对四川省心理学会的成立和开展学术活动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63年12月，中国心理学会召开第一届学术年会，重庆共送去科研论文及资料33篇〔26〕，有五位同志在分组会上作了研究报告〔27〕。

1963年所完成的论文或资料，除已送省及全国学术年会的以外，还有一部分未送出〔28〕。

1963年，重庆市心理学会及高师院校还进行了多种学术活动，如参观“脑电描器现场操作”，听“教学机器与心理学问题”、“网状结构及其机能”等报告，以及讨论学术论文等，共计15次以上。

从1958年到1966年，重庆会员在《心理学报》及《光明日报》、《文汇报》、《重庆日报》上发表的论文及研究报告共计17篇〔29〕。其中大部分是在1962—1963年及其前后发表的。有的论文尚未发表，但其研究结果已为别的著作所引用〔30〕。还有，在专著及《心理学研究动态》、《心理学研究通讯》中发表的译文有5篇〔31〕。可以说1962—1963年是我市心理学研究空前昌盛的时期。